

政 编 辑

朋友，
 愿你做一棵小草，
 ——没有小草哪里会有碧绿的草原
 愿你做一块小石头，
 ——没有小石头哪里会有高山
 愿你做一滴水珠，
 ——没有水珠哪里会有浩瀚
 愿你做一粒黄土，
 ——没有黄土哪里会有苍凉的大地

呵，朋友，
 你何必叹息命运
 要知道，
 你是竭尽全力去创造
 你无私的奉献
 已温暖了人生

呵，朋友，
 请你相信，
 只要小草不断生长，
 只要水滴不断汇聚，
 只要黄土不断堆积，
 那里就有你的价值和位置

何启治 著

何启治

作品自选集

从《古船》到《白鹿原》

中国教授闻纽约

少年鲁迅的故事

广东教育出版社

何启治

何启治

作品自选集

● 何启治 著

从《古船》到《白鹿原》

中国教授闯纽约

少年鲁迅的故事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启治作品自选集/何启治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6

ISBN 7-5406-5776-6

I. 何… II. 何… III. ①编辑工作-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G232-53②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9746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890 毫米×1260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30 000 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ISBN 7-5406-5776-6/I·119

定价: 20.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34120440

何启治和他的《文学编辑四十年》

(代序)

何西来

这是我第一次为一位做了一辈子文学编辑的人写专论。

拿到启治送我的《文学编辑四十年》，已经两年多了。这是一本与他编辑生涯有关的文字专集，有的文章在结集之前我就在报刊上读了，成书后也曾翻阅过其中的一些篇章，颇受教益，但印象比较零碎，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看法。新近，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从头到尾细读一遍，遇有会心处，随手还写了札记，做了旁批与侧注，更觉得获益匪浅。一是学到了许多东西，知道了许多事情；二是“以文会友”，通过读启治的文，更深入地了解了启治四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他的心路历程，他的为人和品格。于是欣然命笔，以成此文。

难得是真诚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有“覈文辄见其心”的话。到底能不能“辄见其心”，关键在于写作者临文是不是真诚。只要作者是因情而作文，而不是如刘勰所不屑的那样“为文而造情”，读者就不难通过阅读而窥见其心。启治的文章，即属此类，是能够“覈文辄见其心”的。

收在《文学编辑四十年》里的文字，长短不一，类型亦不

尽相同，不乏佳构，但也有急就文章，要说每一篇都达到了怎样了不起的水平，那也未必是实事求是，然而，它们都反映了作者写作当时真实的思想和感情，没有伪饰，亦绝少故作的态度。几十年的文章，能如此，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难得的是真诚。这是我读启治的文字时最突出的感觉。唯其真诚，故见心，见性。见心性，故不隔，易沟通。在当代，巴金老是最讲临文的真诚的，所谓真诚，就是心里时刻有读者，把自己坦诚地交给读者，以实现通过作品与读者的交流。所以，真诚也就是对读者最高的尊重。巴老从走上文坛的第一日起，就奉此为圭臬，至今不渝。晚年做《随想录》，更是通过严格的自我解剖，而解剖社会人生，解剖过去了的那一段历史，从而赢得了万千读者的心。当然，也有个别“左”得离谱的人质疑：难道真诚就好吗？他们其实是不以巴老之倡导真诚为然。他们信奉的是与真诚相反的原则，不足为训，故无损于巴老的伟大。我不敢说，启治一定受了巴老多少影响，但巴老为人是当代操觚为业者的楷模，启治的真诚的文学观，他临文的真诚心态，无论如何属巴老一脉，这从他的《三访冰心》里就不难窥见了。不过，我倒是觉得，对启治的为人为文影响更大的是鲁迅。鲁迅的文字是“血写的”，而不是墨写的，他把自己的血一滴滴滴过去，以饲来者。那是真正从心里，“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文字。启治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研究鲁迅，学习鲁迅，他的真诚源于鲁迅精神的熏陶，自然也受到了前辈编辑韦君宜等的影响，他评价韦君宜的《老编辑手记》，就一再称颂作者为人作文的真诚。

在中国的传统文文化，特别是传统美学中，真诚，从来都是最高的规则 and 最重要的范畴。儒者强调“诚”，道家重视“真”。儒者把诚作为自我人格修养的原点，讲“诚心正意”，主张先立德、立人，而后立言，提出“修辞立其诚”，以诚为善，以诚为美。道家把真放在宇宙万物本源的位置上评说，甚至把道的精髓归结到真。真既是至高的伦理范畴，又是至高的

美学范畴。真诚的概念其实包含了儒道两家的伦理观和审美观。在东汉王充的思想体系里，实诚是一个核心的概念，这实诚，略同于真诚。陶渊明的诗歌精要在真，所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里说他“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李白和杜甫，从表面看，一个思想近道，一个思想近儒，但他们的诗歌美学的核心都无不表现了主体的真诚。李白纵论诗史，推崇的是“清真”；而清代的浦起龙则说老杜诗“全从一片血诚流出”。我从启治做人作文的真诚，联想开去，追溯到巴老鲁迅，又远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要妙，是因为在当今文坛浮躁之风劲吹，有些作家不注意道德自律，不注重人格修养，追时髦，赶浪头，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全无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时候，这种真诚尤其难能可贵。

启治临文的真诚，表现的其实是他的人生态度和编辑态度。说是表现人生态度，是因为他的文章无不涉及人，人的命运和人们的关系，而文学本身就是“人学”，所以无论怎样评说，都不能不体现他的人生价值判断。说表现编辑态度，是由于他作为职业编辑的特殊身份。而他的编辑工作，也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他是真诚地对待人生，并且对待他一生为之献身的编辑工作的。他并不掩饰他为此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另外，对于那些至今回想起来还不免让他汗颜的东西，他也不掩饰自己的愧疚。他说：“所谓愧，一则指四十年来的编辑工作本来可以少一些失误，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出色一些。二是为自己在历次以‘左’为特征的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感到羞愧。谨以所谓清查‘五·一六’为例：1970年寒冷的春天，在‘逼、供、信’的压力下，我被迫公开作了子虚乌有的‘交代’。”确实如他所说，几十年间曲折多变的历史和起伏跌宕的人生，谁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而谁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毫无缺憾。问题是能不能多些真诚的实事求是的反思，而不是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

编辑在文学活动中处于作者与读者的中间位置。对作者来

说，他们是作品的最初读者，作品通过他们的编辑、选择，有时甚至需动手修改，才得以出版，才变成社会文化产品，然后得以流通，被阅读、被欣赏；对于读者来说，他们读到的作品，实际上是经过了编辑的手，经过了编辑最初的选择与加工，而出版本身就是一种推荐，何况他们读到的作品，在其编辑定稿的过程中，已经包含了编辑们的心血，只不过一般读者容易忽略这一点而已。因而，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负责任的编辑，都不能没有真诚。何启治正是一位对这种中介位置高度自觉的真诚的编辑家。真诚在他，是一种职守，一种责任。他用真诚，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桥梁。

敬业精神

就我多年与启治的接触，他不属于那种盛气凌人、锋芒毕露的角色，给人的印象是沉稳、朴厚。他在《文学编辑四十年》的代序里不无自豪地讲了这样一段话：“人应该谦虚，但在敬业精神，热爱人文社、《当代》杂志这一点上，我可以不必说矫情的、过谦的话。我也曾经多次在私下里或公开的场合对我的同事们说过：我们每一个人大都是一般的人才，但人文社、《当代》杂志可以被视为当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巨人’之一，伺候好这个‘文学巨人’应当是我们光荣的责任。”启治为人谦和，但决不是所谓“谦谦君子”，谈到他的职司，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他所在的那个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功勋团队——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觉得没有什么好谦虚的。怎样想，就怎样说，很实在，也很真诚。在这段话里，启治特别提到了敬业精神，他的话可以认为既是他对敬业精神的一种宣示，也是他对自己四十年编辑生涯从敬业角度所做的评价。这是一种团队精神，也是人文社的传统，体现在几代编辑家的业务实践上。

启治的敬业精神，首先表现为他对文学编辑工作的热爱。1959年大学一毕业，他就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如

果说这第一步并非出于他个人的选择的话（因为那是一个没有多少个人选择的权利的时代），那么，在以后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时，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学编辑的岗位，在人文社干了一辈子，直到退休。他为自己终生选择了编辑这个职业而感到骄傲。

选择一个岗位，热爱自己所从事的编辑工作，勤勤恳恳，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终身不渝，这就是敬业。敬业，是一种操守，一种道德境界。它是职业道德的基础，是干好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前提。敬业精神，对于行为主体来说，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禀赋，而是长期培养和习练的结果。“敬业”一词，从词源学上来考察，最早出现在儒家经典的《礼记·学记》中，原话是，“三年视敬业乐群”。按朱熹的解释，这敬业，就是“专心致志以事其业”的意思。《学记》是反映古代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三年视敬业乐群”是说学生入了大学，到了第三年，就要考察他能否专心于学业，并且乐于和朋友相互切磋，团结友爱。可见敬业精神不是一下子可以养成的，而要经过长时间的培养教育。后来这敬业之业也就从学业扩展开去，泛指事业、专业、职业、技艺等五行八作的所业、所事。于是敬业精神也就作为一种普泛化了的美德而被人们世代传承。

自古至今，敬业精神之所以作为美德传承不衰，乃是因为它是事业有成的前提，从来没有不敬业而能成业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是20世纪后半世纪以来我国文学界的一家功勋出版社，是新中国出版界的一个重镇，出过许多好书，影响深远的书，巨著。作为团队，何启治称之为“巨人”，是当之无愧的。这个出版社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业绩，就是因为它是由几代敬业的编辑家、出版家支撑的。敬业的何启治，属于这个敬业团队行进中的接力者之一，上有所承，下有所传。

启治是有心人，勤于思索，勤于动笔。他的敬业精神盖属于韩愈所说的“业精于勤”。他不仅用笔记录了自己四十年编辑生涯中的经历和体验，而且对于支撑了他们那个团队的辉煌

业绩的几位重量级的人物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与评论，写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品格。如在《播鲁迅精神之火》里，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小标题对冯雪峰晚年编注新版《鲁迅全集》所做的工作的记述，不仅有很高的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的史料价值，而且让读者看到了这位革命文艺家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品格。在这篇文章中，启治对冯雪峰作了这样的评价：“冯雪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鲁迅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是公认的了解鲁迅后期思想和创作的‘通人’，也是对鲁迅著作的研究、注释、编辑和出版宣传工作有卓越贡献的元勋。”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是开国以后思想文化战线上极左思潮日渐猖獗的年代里的罹难者。启治写了即使身处危境，在对待鲁迅著作的编注上，仍然一丝不苟。例如提醒鲁迅日记研究者包子衍：研究鲁迅就要有鲁迅精神，一定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决不能搞实用主义——那些对鲁迅搞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的人，哪里是在研究鲁迅，他们不过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鲁迅罢了。启治还在文章中记述了冯雪峰在做了癌症手术不久就读了鲁迅研究家朱正写的鲁迅著作补注文稿，并写了复信，提了意见。要朱正修改后再寄给他看，而且连朱正行文的“口吻”中流露出的“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也特意提出来，让其注意。但是，他没有看到朱正寄来的修改稿，就在当月去世了。那是1976年的1月30日，正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黎明前的黑暗期。在这黑暗期，在冯雪峰处境维艰而又病垂垂危的日子，他的这种作为编辑，作为鲁迅研究家的道德操守和敬业精神，肯定给启治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他的敬业，正是从这些前辈身上继承过来的。

除了冯雪峰，启治还写过《“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秦兆阳谈文学编辑工作》的长文，而以韦君宜为评说和记述对象的专门文章，至少有三篇：《评韦君宜的〈老编辑手记〉》、《夕阳风采——韦君宜素描》和《耕云播雨四十春——

韦君宜畅谈编辑的素质、修养、职责和作风》。韦君宜和秦兆阳，都是名重一时的作家、小说家。秦兆阳的长篇《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颇受读者欢迎，而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则给他带来了命运的逆转，但也使他成为20世纪后半世纪以来的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绕不过的人物；韦君宜的中篇小说《洗礼》是名作，而她卧病之后所写的《露沙的路》和《思痛录》在文化思想界更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无论是韦君宜，还是秦兆阳，他们的主业都是编辑，而且都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干了一辈子。秦兆阳说：“‘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韦君宜则以“老编辑”自称，告诫年轻编辑：要做一个好的文学编辑就要像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等前辈一样，具有为文学事业献身的伟大精神；就要排除升官、发财等私心杂念而努力做到正直、公平、无私；就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胸怀、胆识和勇气；就要努力完成基本的思想修养和文化知识修养，具备良好的编辑基本功（包括鉴赏、判断能力，语言文字基本功等等）。韦君宜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她和冯雪峰、秦兆阳一样，以自己的敬业精神做了后来者的表率。启治的敬业当然与自己的努力，与自己的自策自律分不开，但这些先辈们的言传身教无疑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评论家型的编辑家

韦君宜认为鉴赏力、判断力和语言文字基本功等是一个称职的、敬业的编辑必须具备的能力，这是很对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能力也同时是一个评论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编辑的审读，是一部作品面世前最早的评论。判断一部作品有没有出版的价值，立意怎样，内容如何，人物塑造、语言、结构、技法达到了怎样的水平等等，都需要编辑具有评论家的眼光。而这种判断，就是评论的内容。如果把这些判断，形诸笔墨，写成文章拿出去发表，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评论了。

不同的是，评论家评论已出版的文学作品，已是成品，说长道短，面对的是既定的事实，一般来说评论家并不直接参与到作品的修改和加工的过程中去。但编辑除了对作品提出意见，作出判断外，还要帮助作者把作品修改得更好、更完整、更成熟些，有时还要亲自动手，做最后的加工处理，完成定稿出版的最后一道工序。所以，编辑实际上是深深地参与到作品的创造过程中去的。高水平的编辑，不仅能很快看出作品的价值，包括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且能准确地看出作品的缺陷，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帮助作者进行修改，使作品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所以，许多作者都把高水平的给过自己真心实意帮助的编辑看作是老师，现在已经是名教授、名学者的王富仁就曾在一篇文章里称《文学评论》原副主编、著名编辑家王信是他的老师，是许多人的老师。我想，启治也是这样的编辑——老师。他以他的前辈编辑家为师，对许多如今已成传世之作的修改，都提出过具体、恳切的意见和建议，因此，许多出了名的和没有出名的作者也都称他为老师。读了他的《文学编辑四十年》，你就会感到，他是当之无愧的。

许多编辑家并没有把自己对所编作品的判断，写成文章拿出去发表，所以人们并不把他们看作是兼有评论家身份的。但启治不同，他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编辑什么，就研究什么。所以，大凡他参与编辑或审读过的他比较喜欢的作品，他都写评论文章。比如选收在《文学编辑四十年》第三辑里对于长篇《奔腾的大海》、《大上海沉没》、《女巫》、《我是太阳》、《天下财富》、《第二十幕》、《尘埃落定》、《幻化》、《歇马山庄》和《狂欢的季节》的评论就是如此。这些作品都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些评论大都写得很实事求是，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有些评价，在我看来，不见得准确，但却是他实实在在的想法和感受，属于见仁见智之不同。在第五辑，还收了几篇他做《当代》负责人时为几篇作品所写的编者按和他作为书籍出版终审人为《白鹿原》、《狂欢的季节》等

所写的终审意见。这些都可以拿来当作短小的言简意赅的评论读；形制虽短，却多能切中肯綮。

在多数情况下，他固然是把研究和评论与自己编辑的业务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评论对象多是他所编辑的作品，但有时也不尽然，他也常常放开眼界，关注更广泛的文学领域。

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编注，他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了鲁迅的著作。他所写的《播鲁迅精神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不仅为鲁迅研究保存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鲁迅著作出版史的文献价值。这样的论述文字，没有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注释工作是写不出来的；或者参加了而没有用心，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涉猎，也是写不出来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底蕴，秦牧才推荐和鼓励他写出了颇得好评并获奖的《少年鲁迅的故事》。而且我认为，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花工夫学习、研究鲁迅，并有著作问世，这对形成他的人生理念和编辑理念，对于形成他的文学观和批评观，都是非常重要的。像许多同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受到鲁迅的影响，也可以说是终身的。

如果说研究鲁迅和评说鲁迅，是和他的编辑工作对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收在第四辑里的《熔金铸史写春秋》，则是有关苏叔阳文学创作的专论，属评论中的作家论。被他评到的作品如长篇《故土》固然曾发于《当代》，因而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业务有点关系，但苏叔阳的剧作则和启治的编辑工作无直接关系。这篇文章不能说是启治最好的评论，但他能在评价《故土》时，考虑到作家的全人和全部作品，借此立论，这就比一般编辑的就一个作品谈一个作品，视界开阔得多，也深入得多了。

《五十非梦亦非烟》是启治为他的武汉大学老同窗、评论家缪俊杰留下的一个侧影。缪俊杰也是我做研究生时的同窗，彼此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因而算是相知较深。就我所知，启治的这篇文章，是较早研究和评价缪俊杰的文章中最有见解也是最好的一篇，不仅评价到位，而且情文并茂，不仅写出了这

位评论家的特点与风格，而且写出了他的潜力。这应该算是一篇关于评论的评论。

放开眼光，突破自己编辑对象的范围，就使作为编辑的何启治能够不囿于自己编辑经验的一隅，获得更大的见识和更明敏的判断力。而收在第二辑里的许多文章，如《题材的开掘和美的创造》、《套子·模子·路子》、《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和寻求新的角度》、《更新颖、更深沉、更丰富些》等，比起普通的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带有更多的综合的和理论的性质。这些文章或从特殊的理论角度切入研究文学作品创作的规律，或有感于陈陈相因的弊端而力主独创，或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诊脉并提出建议，或对一种小说创作的潮流提出自己的评判，它们一方面涉及了当前创作实践的性质、趋势和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很强的理论探索的色彩。从编什么，研究什么，评论什么，写具体作品论，到研究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写作家论；再到不囿于自己所编的作家作品，而写综合性的理论色彩更强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是一个真正以编辑为职业的评论家，或评论家型的编辑家了。

与作家共进退

何启治在《五十年光荣与梦想》这篇同作家柳建伟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中，曾有一段让我非常感动的自白：“我曾多次表示，我读《白鹿原》时还有一种职业的‘兴奋感’和‘幸福感’。有朋友告诉我说‘幸福感’有点那个。那个意思我懂，无非是不含蓄，有点太下蹲状了。今天我仍愿这么说。这种感觉是一个文学编辑在阅读显然会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鸿篇巨著手稿时的心情。就像一个作家写出了自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重要作品时的感觉一样。不管是作家，还是编辑，这种职业状态一生中不会太多。我终审过的长篇小说已有几十上百部，只有在读《白鹿原》和《古船》

时，出现了这种状态。一旦这种状态出现了，它就可以驱使一个把编辑当终身事业的人，把个人的利害得失彻底忘却，坦然面对一切可能的意外，与这样的作品共荣辱，与写出这种作品的作者同进退。一个编辑，如果对这样的作品在基本评价或判断上有失误，那就意味着人生道路的大失败。”我之所以不嫌其长地引用这段自白，是因为它写得很直白、很真诚，能够反映一个职业编辑的独立品格和敬业操守，反映了他对编辑职业的敬畏之心，以及他的自信心、自豪感和神圣的守土意识。这段话的要害是“共荣辱”、“同进退”六个字。只有到了如我们这个年龄的过来人，才能真正懂得在近几十年来我国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这六个字是多么不容易做到，要做到又意味着什么。

何启治当然算不上什么英雄豪杰，我也无意于把他说成是中流砥柱，他只是一个负点责任的普通编辑，但是，如果没有以他为代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们的慧眼识珠，没有他们冒着很大风险的坚持和据理力争，这两部作品不是没有被埋没的可能；即使出版了，也难免厄运，而被打入冷宫，以至长期埋没。

何启治在他的《文学编辑四十年》里，曾多次提到《古船》和《白鹿原》的话题，但真正介绍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以及出版后碰到的麻烦的地方，却以定稿于1998年的《从〈古船〉到〈白鹿原〉》最为详细和系统。在这篇文章里，他分立两个专节，“说不尽的《古船》”和“永远的《白鹿原》”讲这两本书的事。

他认为“《古船》是张炜用心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屋及乌，他甚至记住了张炜的生日，说张炜的生日与他入党的日子是同一天，即1956年十月革命节那一天，11月7日。真是有趣的巧合。他甚至能够清楚地记得张炜拿着《古船》的稿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初次见面的细节。从张炜那里，他知道这部作品单是前期的资料准备就用了整整四年，写作和修改用了两年，显然是作者呕心沥血，精心结撰的一部作品。

读了作品，他眼前为之一亮，他体验到了职业编辑遇

到好作品时的那种兴奋，他对《古船》有了自己的评价：“《古船》所描述的，果然是深沉厚重悲壮的动人故事，其中关于土改，更不乏惊心动魄的画面。它所具有的悲剧美，令人回肠荡气，感慨良多。读这样的长篇小说，深深感受到历史的呼唤。我们有值得自豪、骄傲的光荣历史，也有悲惨、辛酸的民族苦难史，滴着血、流着泪的历史。小说以其强烈的现实感、深厚的历史感和未来意识，给人以感染和启迪，使我们面对复杂、艰难的时势时，仍能看到希望。总之，我打心眼里认为，这是一部真实感很强，塑造了一些内涵丰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具有开拓意义和史诗品格的大作品。”这段评价既包含了编辑家遇到优秀作品时的直觉，更是评论家理性把握的结果，人们不难从中感受到某种对自己职业判断力的坚强自信。

不过，在看到作品成功的值得肯定的主导方面的同时，启治也看到作品存在的某些可以改进的缺陷，如作品描写土改中出现的乱打乱杀的错误倾向，尚需把握好分寸；艺术上也有欠圆熟之处等等。从这里又可以看出职业编辑家严格的、挑剔的眼光。正是这种从根本上来说，是建设性的、挑剔的眼光，使得所有经手的作品，在面世前都尽可能加工、修改得更完善些，少些本可以避免的纰漏，少些马后炮式的遗憾。《古船》就是在以启治为代表的《当代》杂志的编辑们的帮助和推动之下，经过作者认真地修改，刊发面世了，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广泛欢迎，好评如潮。但是，也有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一部作品出来，你这样看，我那样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也是文学批评中的正常现象，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讨论来解决；即使一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也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先放一放也无妨。问题是当时的某些领导人采取行政干预的办法，对作品发表了严厉的不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以致不让如实地发表有关作品研讨会情况的报道。如果不是何启治据理力争，并以个人的名义向社长和总编写了书面保证，愿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事情也就肯定搁浅了。

淘尽狂沙始见金。后来的事实证明,《古船》无愧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杰作之一,不仅有眼力的专家、学者、文学家给予很高评价,就是普通读者也反响热烈,初印、重印都数以万计。

《白鹿原》也遇到过类似的麻烦。

看到《白鹿原》的书稿,启治深为这部被他称为“雄奇史诗”的作品在艺术基调上的凝重和悲壮所感染、所震撼,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赏心情。他说:“这种对一部大作品发自心底的赞赏(尽管难免会有具体的修改意见或批评),会使有胆识、有经验和责任感的编辑情不自禁地向自己的领导拍胸脯保证;如果对这样的书稿在基本评价和判断上有失误,那就真是昏了头,瞎了眼,因而敢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如果受到简单化的干预、责难和种种压力,也能坦然面对,不但敢为作品辩护,与这样的作品共荣辱,与其作者共进退,必要时也可毫不犹豫地领导立下‘军令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不仅作为终审,签署了以下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而且作为责任编辑署了名,以示郑重,以示负责。这在他数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也是罕见的。

在读稿的过程中,包括何启治在内的编辑们,也充分注意到作品中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和不是十分妥当的地方,并且都与作者一起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和查证,也做了必要的删削,直到他们认为有把握了,才把作品付梓和读者见面。然而,还是遇到了麻烦。在与作家柳建伟的谈话中,启治说:“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迄今为止,我没有见到上级关于《白鹿原》的任何结论性的指示,书面的固然没有,连电话通知也没有,书照样印着,照样受到读者欢迎,却就是不让宣传。今年五月天津开会评‘八五’(1991—1995

年)优秀长篇小说时,一位临时主持人也粗暴地不让提《白鹿原》,它连候选资格都没有。我和千万读者一样,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有关主管部门领导人批评‘《白鹿原》和《废都》一样,写作的着眼点不对’。并明确把这两部长篇小说‘列为影视禁拍作品’。(见1993年12月13日《羊城晚报》转引《金陵晚报》文)后来,我从一个在新闻界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上级机关某负责人曾在一次什么会上说了批评《白鹿原》,不要再宣传《白鹿原》的话。然而,这样就真的把《白鹿原》晾起来了。不管什么正式场合和活动,《白鹿原》成了一个敏感的、可能招祸的东西,都不敢碰了。毋庸讳言,这种极不正常的氛围,影响了我们的全面工作。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凭着良心和良知,一致把‘人民文学奖’授予《白鹿原》。”在这里,启治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场权力和良心、良知的较量的一角;证明了启治他们的艺术敏感和专家眼光的正确。

作为编辑家、出版家,何启治像许多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外的那些勇于任事的先行者和同辈人一样,真正做到了与他们心目中的优秀作品的作者共荣辱,同进退。这种“共荣辱,同进退”,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出版管理体制之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要做,就要准备付出包括身家性命在内的沉重代价,特别是碰到文化专制主义猖獗的年代。《古船》、《白鹿原》的作者和编者,有幸生活在一个日渐开明的年代,否则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结局。至于启治,则肯定会受到牵连,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以,何启治才敢底气十足地说:“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堪称为‘大书’的优秀作品,而不知呵护、赞赏和热爱的民族,也是可悲的。”他还豪情万丈地写道:“呵,《白鹿原》,你是中国当代文学不朽的诗篇,你是千万读者心中永恒的歌。”他几乎超离了评论,变成了情不自禁的礼赞。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评论,但我相信他出于真诚,他也就确做到了“同进退”。